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1)

重建家园的外乡人

□汪雨濛

谢宗玉是一位多栖作者,他写小说、写散文,还涉足影视创作与评论。作为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子弟,谢宗玉的文学目光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地投射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通向城市道路上的挣扎成为了他最初的文学资源。后来,他成了一个警察。刚离开那种带着青春气息的彷徨与呐喊,就必须直面城市暧昧地带许多隐秘、惨淡和惊悚的人生。这份职业拓展了他的生活半径,迫使他游走于城乡之间,赋予了他书写城市的新角度,也拉回了那个一直存在于他心底的乡村。现在,广为人知的谢宗玉,竟然是一个实力不凡的乡土散文家。也许会有人感到诧异,一个是书写城市黑暗传奇的小说家谢宗玉,一个是描绘乡间日常生活的散文家谢宗玉,他们究竟是分裂的,还是交会的?

都市外乡人

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进城务工经商,还是通过高考来到大学深造,大批的农民及农家子弟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到了城市,谢宗玉也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的乡亲们看来,他的人生之路可算是一个非常顺利甚至辉煌了,他不仅一口气读完了大学,而且留在了城市,进了公安系统,成了“吃公粮”的人。不过,这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艰辛是那么的刻骨铭心,以至于成为了他文学的出发地。其实,这样的小说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路遥的《人生》便是著名的例子。细细读去,谢宗玉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带着高加林的影子,比如《纪念日》中的“我”,一个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不得不在一家报社做着微不足道的实习生;还有《近距离相吸》中的“我”与阳,无疑是个两个背负了太多的期待与恩泽的“学习机器”……

但是,谢宗玉的小说并没有停滞在这种自传性质的书写中,他的职业给了他新的机遇和视角,去观察“城市”更为广阔深邃的空间。这种观察是多向度的,一方面,谢宗玉仍然在继续着他的内在观察,他现在完全是一个体面的“城里人”,这样的城市“新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谢宗玉自己深有体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警察,他又可以深入到城市的黑暗处,那里活动着他完全陌生的人生。他们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他们不断地被乡村被城市抛弃,又顽强地打进来,不管这些人物在怎样的面具下生存。

长篇小说《末日解剖》的主人公王泽荫出身农村,考上了城里的医科大学,成绩出色的他却因为没有背景被分配去做了别人不愿意从事的法医工作。虽然他业务娴熟,成为局里倚重的“专家”,却无法像别人一样光明正大地恋爱结婚。他和妻子苏芳原本是和睦的夫妻,然而这种和睦却是以王泽荫对自己职业的隐瞒换来的。偶然得知真相的苏芳无法接受自己丈夫的欺骗与令人毛骨悚然的职业,两人的婚姻在经历了冷战、家暴、出轨之后终于走向崩溃,苏芳自杀,王泽荫发疯,而王泽荫曾经犯下的罪行却重新浮出水面——他曾经借在一家合资医院做兼职外科手术的便利,盗取了多具女尸的身体部位,拼合成了一具魅惑人心的新的身体。

谢宗玉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虽然极端而夸张,甚至有点科幻的意味,却真实地反映出这些早就跃出农门的“成功人士”面临的身份焦虑。他们是因为乡村文化无法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与理想才选择了离开,可是,他们所向往的城市却没有实质性地接纳他们。他们被

苛待、被挤兑,被无形地隔离,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才在城市疑似站稳了脚跟,但他们内心的疲惫与孤独却无人言说,他们注定是城市永远的外人。王泽荫最后创造出的那具女体不仅是欲望的化身,更代表着王泽荫对新生活最初的病态向往,他将所有完美的部分拼合在一起,却无法赋予这完美的身体以生命,他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一个空洞、艳丽而恐惧的幻梦,最后只能与它一起,埋葬在阻隔于现代文明的远方。

另一群人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外来者。他们也同样怀揣着“城市梦”,但实现的途径却异常的艰难曲折。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他们只能是游走在城市的打工仔、无业者,甚至沦为窃贼、劫匪和诈骗犯。比如《借你一颗胆》中的杀人犯“军警”和以他为中心的那个松散的“盲流”集团,还有《黑色往事》中的那群少年犯。在谢宗玉的笔下,这些并不怎么光彩的人物形象却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丰满与复杂。他们精明又义气,自私自利却肝胆相照。他们在多年的阴暗生活中练就出了朴素的生存智慧,表面上逆来顺受,却可以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大事临头,堪称有勇有谋。他们填充在城市的角落,是城市的背面,是被隔离了的底层,他们没有同类以外的交际圈,以特殊的生存本领适应着原本陌生的城市,他们无需城市的认同,他们的本身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城市生态。

这是谢宗玉的城市传奇,他在讲叙当代都市多元中被掩盖的二元对立。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面对哪一种“外乡人”,谢宗玉的故事都弥漫着浓重的焦虑。这种焦虑感源自上述农门子弟内心持续的漂泊——谢宗玉在为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城市新人类的文化身份背书。看上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城乡入城已经成为移民的主要途径。但这种单向的流动和迁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命运和生活方式却是令人怀疑的。这是一种本质上的人生尴尬和文化乡愁,所以,谢宗玉无意于人物世俗层面的生活方式,他剥开他们或鲜亮或黯淡的外衣,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惶恐与焦虑,一颗颗缺乏安全感的、流浪的、无根的内心,而这,可能正是这个社会最深处的分裂。

村庄留守者

谢宗玉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少年“自传”,写到了他的故乡瑶村。对于久居城市的谢宗玉来说,故乡已经非常陌生了。他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到,当他回到故乡的时候,村里的人已经不认识他了,而他也已经不认识曾经生活过的村庄。谢宗玉许多有关瑶村的散文,这些作品关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城市生活中感到漂洋无根的他,顺着自己来时的道路,又回到了乡村。这部分散文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们是过去的、完整的、诗性的。我们在谢宗玉不少散文中品读到了古老与淳朴、神话与梦幻、奔放与自由。在这里,《国语·楚语下》中所谓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并不遥远,人和神祇相与杂居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

在这些篇什中,作家恣意书写,百无禁忌,日常生活之中,常常穿梭着鬼神的魅影,既神秘又温馨。他曾在《鬼节扶乩》中写到瑶村持续半月的鬼节,写到传说中祖先与孤魂野鬼之间的斗争,以及通过扶乩与祖先的沟通;在《喊魂》中,他如同白日梦一样描写了魂魄的活动与作息;在《行踪飘忽的捕蛇人》中,他对中原历史人文的关注和思考耐人寻味,对该镇人、事、物的描述也具有独特新颖的审美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路店古镇”,既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土壤,也是作家营造的精神家园。作品字里行间倾注着作者对乡土人文的真情实感,既是作者在离开故土、经过人生沉浮后的思想沉淀,也是其在物质化的时代对自己内心梦想的坚守与回望,具有观照现实和反思历史的意义。

(欣 闻)

商战小说《空手套白狼》受读者关注

本报讯 作家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长篇商战小说《空手套白狼》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其间世后在全国多地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均有不俗表现。6月16日,作家出版社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了《空手套白狼》读者见面会,作者彭叔与到场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空手套白狼》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煤矿热”的宏大背景下,展现了10年前陕北驼城群英煤矿的股东之间上演的一段段波诡云谲的厮杀和斗争。书中塑造了阅历各不相同、知识背景迥异的“淘金者”群像,为了追求利益

的最大化,他们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制造了毁灭、叛变、抓捕、争夺董事长、连环官司、邮包炸弹、矿难、血案等各种事件,甚至在监狱中策划了“慕尼黑”阴谋,可谓惊心动魄。

来自深圳的彭叔曾在商场打拼20余年,参与了海南开发热、房地产热、煤矿热和炒矿热,但在经商之余,他没有忘记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在《空手套白狼》中,作者除揭露了官场腐败等社会现象之外,还思考了人性的贪婪、恐惧和麻木以及现代人修心、修行的现实意义。

(现 觅)

谢宗玉,生于1972年,湖南人。1996年开始写作,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散文、剧本等。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长沙文艺之星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天地贼心》、散文集《田垌上的婴儿》《村庄在南方之南》《遍地药香》等。

一方面是蛇的修炼,另一边则是捕蛇人的神通;而在《麦田中央的坟》中,他让你不由得不相信祖先的轮回……这些作品与四时农事、童年游戏、乡村仪式放在了一起,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安然的、温柔的,同时也已经远去了的中国南方乡村。

现实的瑶村是黯然神伤的。大批青壮年离开了瑶村,现在的瑶村在谢宗玉笔下仿佛一片寂静的乡野。远涉城市的瑶村人感到孤独与无助,而留守在瑶村的人大概也有着类似的感觉。原先的丁兴旺、人声鼎沸自然早已经远去,到后来,每年固定伴随着农忙季节而回归的热闹与繁盛也不知什么时候暂停了。老人们孤独地坐在昏暗的厅屋里,再也没有了几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妇女们终年不得见自己的丈夫,只能独立支撑家务和农事,抚育着不更事的孩子。更有些人把整个家族连根拔起,永远地离开了瑶村。

谢宗玉曾经将一个村子比作一棵树,树上的叶子便是村人的生命,叶子一片接一片飘落,而剩下的叶子便在数着自己的气数。这种在农耕文化时期颇享天命的悲悯而安详的生命姿态,在现下看来只能显露出惊惧与绝望。离开的瑶村人像是无根的浮萍,而作为根的瑶村也逐渐衰败下来,不能再起到固本定心的作用。这是瑶村的现状,大概也是中国无数乡村正在经历的现实。青壮年的离开带走了乡村最旺盛的生命力,也带走了乡村最基本的生产力与人际平衡。

谢宗玉实际上是在记录历史,他所描绘的凋敝的乡村场景无疑是中国乡村毁灭沉沦的酸痛历程。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温情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顾各的自私、冷淡与隔膜,是生存危机所带来的争执、矛盾乃至仇恨。乡村再也没有安详与怡然,虽然它看上去更加平静了,然而,这种平静毋宁说是绝望的死水。老人们将自己的寂寞与孤独凝固在千年屋的清漆中,妇女们把等待与失望插进日复一日的秧苗,面对空旷的瑶村,她们的守候仿佛失去了意义,谁还会愿意回到这个落后的、衰败的家呢?他们越来越怀疑,这个凋零的家,有什么值得坚持与守护?这就是曾经人神共舞的村庄,这就是曾经不仅为自己,同时也为城市创造价值的乡村,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不断的“礼失”而担当修复功能、延续历史的村庄。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文化历险——城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和完善起社会的文化造血机制,而原先的文化母体已经没有了再生功能。谢宗玉《一个夏天的死亡》中写到了那么多的自杀,并且指出了这种现象在当代农村的普遍性,我倾向于将其作隐喻式的解读。笼罩着绝望与孤独的乡村,蔓延着冷漠与仇恨的乡村,是不是正在走向死亡的不归路?

“招魂”的植物

很多人熟悉谢宗玉,是从他的《遍地药香》开始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乡村植物志,也同样可以看作一部乡村的日常生活指南。植物的用途固然是多种多样的,有作为食物的马齿苋、鱼腥草、木槿花,有作为药物的半边莲、山薄荷、灯心草,还有作为玩物的苍耳子、指甲花等等。但是,在谢宗玉的眼里,植物与人类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共生的、灵性的。植物对于乡村来说不是单纯的作物,而是接近神祇的存在。每一株植物都有着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也有它们各自不同的与

乡村的人们交互方式。柳树是为爱情而亡的情圣,车前草是开山探路的忍者,棕树是奋发向上的精英,臭牡丹是特立独行的哲人,苍耳子在无意中揭穿了不伦的恋情,指甲花启蒙了女孩子爱美的心思,鱼腥草拯救了饥肠辘辘的砍柴人,牛王刺划伤了顽皮的孩子却点醒了朦胧的初恋……更有些植物,或承载着古老的仪式,或带着原始的蛊惑,一直深入到村民的精神世界。端阳节驱毒的七叶樟、辟邪的艾叶,还有妩媚得魔人的莲和焰峰柴,给原本开阔明朗的乡村带来多少时隐时现的梦幻与神秘。南方的乡村生态就应该如此,植物是邻居、是帮手、是朋友,有时候也是敌人。千百年来,瑶村人就这样与植物一同生活。离开了这些植物,人的生活也无法完整。

植物的生活是谢宗玉的另一种乡村价值叙事。费孝通曾说过,乡村人口的相对固定化,使得乡村的生活长期以“熟悉”的方式运转着,他们面对熟悉的人、熟悉的动植物、熟悉的天气,总有一套熟悉的办法。这套办法流传下来,就成了乡村生活的根基。可是如今,这一切都被打破了,这种熟悉的链条断裂了,植物也已经开始被人遗忘。一片不再经营的桃园、一棵不知何时死去的老树,一些不再会端上餐桌的野菜,都标志着我们正在失去和自然最亲密的关系,以及许多通过自然来传承的乡村价值。

现实是那么的令人伤感,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村庄的时候,还有植物能够长久地固守在那里,当人们对远去的亲朋都逐渐忘却的时候,也还有植物能够维系地方的季节轮回、岁月荣枯,维系我们对故土的回忆。作为一种文化关系,人与乡土植物可谓命悬一线。如果连植物已经被人们遗忘或忽略,那我们与代代相传的经验进行文化对接的依凭,就又少了一种。植物是符号、是象征,如果没有了植物的故事,或者失去关于植物的生活与文化记忆,植物就只能是植物,它们会沉入黑暗,如同史前一样的陌生。因此,是否认识植物,是否记得植物的故事,是否能与植物友好相处就成为了一种尺度和标准,这种尺度和标准是超生物学的,它关系到我们和自然,关系到我们和乡村,关系到我们和传统。

我愿意把《遍地药香》这样的作品看成如《离骚》中的百种香草一样,有着“招魂”的文化意向。不再记得鱼腥草可以充饥,不再感受一棵柳树的爱情,瑶村还是瑶村吗?当远去的瑶村人不再归来,当现在的瑶村变得凋零和空旷时,惟有遍地药香能够唤醒关于自然与传统价值的回忆。谢宗玉固执地将自己的灵魂留在瑶村,留在自己的童年,留给那些永恒的、基本的自然物态,不论是植物、雨水、雷电甚至是8月乡村中的滚滚热浪,都在谢宗玉朴素的笔下汇聚成自然的洪流,只有那片亘古飘荡、万物有灵的土地,才是值得永驻的真正的心灵家园。

如谢宗玉所说,如今太多人的“血和泪都在农村耗干了,进城,只是一具麻木的空壳而已”。谢宗玉的文学创作,从城市写到乡村,从现在写到过去,虽然他的小说与散文显得错综轩轾,他的创作风格也似乎有些“精神分裂”,但内在的谢宗玉一直是单一而执著的。他不断地剖析和煎熬自我,紧密地追寻着自己的乡里乡亲,固执地回忆和诗化着远方的、过去的乡村生活,都是在为自己,也在于为那些漂泊无助的人们寻找可以安放灵魂的处所,甚至在奢望重建一个精神的家园,这可能也是一代人的文化宿命。

■创作谈

2008年大雪前,我从鲁院返回长沙,随后的5年,我基本上终止了文学创作。尽管这5年,我有两个长篇发表,4个长篇出版。但这些作品都是在鲁院或去鲁院之前就有了毛坯。回到长沙,我只是把剩下的事情干完。只要看起来像个成品,我就把它们草草丢出去了,完全没心情顾及艺术水准。

我这是怎么了?去鲁院前汹涌的创作态势和咆哮的创作野心都到哪儿去了?真实原因,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但若有人问起来,我便会给出如下理由:其一,跑到京城,才发现写作的人这么多,我写不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二,鲁七班那些优秀同学的写作态度实在严谨得让人害怕,他们写小说像做瑞士钟表,立意、布局、语言,容不得半点差池。而我写小说,像个拉面师傅,嗨哟嗨哟,几下搞掂,才不管它的硬软粗细,心想,最后不都要吃到肚里去吗?现在才知道文坛叫好的小说是怎么炼造出来的,我这个江湖野路子有些胆怯了。像和尚鲁智深受不了五台山的清规戒律一样,只好撸起禅杖,打道回府。其三,到了京城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所抱的期望与主流创作旨趣大异。很多一线当红作家,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放在语言的雕琢和打磨上,相对来说,没有足够重视作品对社会的概括性、思想的深度以及艺术形式的创新。在目前的中国,只要能把文字反复拍打到表皮泛蜜的程度,再用这种微微泛蜜的文字把一个通俗故事调和好,便会成为一个被主流认可的作家。无奈的是,语言一直是我的短板,同时,我也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我写作,一直是主题先行,写小说像讲道理,这样很难玩下去。所以我决定暂时搁笔,但内心仍然对自己充满了期待。

所幸的是,2008年夏我参加了《人民文学》在湘西的笔会,认识了一个影评家。那天晚上,他在我房间,给我、张楚、沈念进行了电影启蒙,或者影评启蒙。笔会散后,我按图索骥,找出他推荐的10多个电影来观摩。完后又看他 and 网上的影评,我突然发觉,这个东东其实我也可以玩一下。于是就冯提尔的电影《狗镇》写下了第一篇影评。

出于对老婆的信任,我一直让她做自己文字的第一读者。老婆看完很肯定地对我说,相对于小说和散文,你可能更适合搞思想随笔。得到她的鼓励,我信心大增。当即将这篇影评给了《随笔》。文章刊出来后,在网上和其他杂志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此后的几年,我便成了《随笔》《文学界》等杂志不定期的专栏影评家。此后我不但拥有了一大批追捧的读者,还好有些我敬重的人溢于言表的褒扬。

感谢电影,让我在停止文学创作时,又给了我一个痛痛快快胡说八道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影评比文学创作更能让我介入社会和人生。对我来说,书写的动力不过就是一种一定要写出来的冲动和写成后那种无法言说的快感。我不想做文字的苦行僧。如果写作带来不快感,只是冲着名利的,那么,不写作,我也许能获得比预想的要多得多的名利。我做了16年警察,看惯了我的警察领导们在一个城市呼风唤雨的样子,比起任何一个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生活都要“甜畅淋漓”得多。可最后,我仍然选择与他们“决裂”,成了一名文艺工作的组织者。虽然我现在仍然没摆脱工作繁琐的局面,但我并不后悔,我愿意为那些怀抱弃世的孤独写作者服务。

除了影评,我还以书信的形式在《今日女报》上写了两年的专栏,以过来人的身份,与儿子谈性爱体验、性爱得失、性爱道德和性爱选择。写这些时,我内心里充满盈盈爱意,并且自以为对儿子的未来大有裨益,我希望儿子情爱的天空晴朗而无阴云。两年的写作,我一直甘之如飴。等儿子长到18岁,就送给他作生日礼物。有几家出版社争着要出这本书。他们大概是相信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绝对真诚,相信个性化的书写恰恰藏有人类的共性。

这使得我想起了自己的散文创作。我不写乡土散文有好些年了,但人们提到我时,仍然把我划归乡土散文家的行列。而当年我之所以要写乡土散文,就是想,儿子现在的生活,跟我童年时的农耕记忆是多么不相同啊。如果我不把儿时我和父辈的生活记录下来,那么等我儿子、孙子、曾孙长大后,就完全不知道当年他们祖辈是怎么生活的,并且在那些琐碎生活中私藏了那么多的悲喜。也是靠了这份一定要写下来的冲动,在新世纪开始的最初几年里,我围绕父辈生活的瑶村,把几千来的农耕生活写了个遍。我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家族存档,但结果瑶村却成了广大读者或深或浅的一个记忆符号,以瑶村为背景的散文入选好几个省市的语文课本。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我的写作只是一件率性而为的事情。我没有大师情结,不像有些作家朋友一样,坚持要固守元气,出手必定不凡。我没有那个才情,不堪忍受那份磨砺的痛苦。我的写作都是一时兴起。通过这两年,我发现自己胡说八道的领域很是宽广。也许有一天,我还能回到文学创作上来。

□谢宗玉

无序的抒写

豫冀两省作家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主席关仁山率领河北省作家赴河南考察交流。考察期间,豫冀两省作家在河南省文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两省的文化底蕴、现实传统、文学期

刊建设、创作风格异同、长篇小说创作等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关仁山、李佩甫、邵丽、郑彦英、胡学文、乔叶、墨白、刘建东、大解、傅爱毛等参加了座谈会。(冀 文)

专家学者研讨陆健诗作

本报讯 6月15日,由新浪网、影响力中国网、《中国诗歌》杂志主办,作家网、中国诗歌网、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承办的“文学网络传播现象暨《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研讨会”在京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是陆健历时6年创作的一首近千行的长诗,该诗“将诗人对自我的认同关系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展演”。该诗2012

年年底发在新浪网上之后,短时间内达到上万次的点击率。2013年第3期《中国诗歌》杂志也刊发了该诗,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and 评论界的研究兴趣。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以此为题,深入探讨了文学创作与网络 and 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诗歌的经典与大众阅读等话题。

(广 文)

水文化专项基金在京启动

本报讯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6月13日,中华水文化研究与运营专项基金签字暨全国安全健康公益饮水工程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该基金将对中华水文化、水环境、水健康等进行研究和探索,保障公益饮水工程的顺利实施,通过反映中华各族人民对水的眷恋和珍视之情,努力实现人们对水的科学认识、健康使用和有效保护,呼吁各界为

解决水问题献策出力。

据介绍,全国安全健康公益饮水工程由文化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共同发起,旨在打造公共饮水服务体系,提供健康饮水指导和科技,践行科学节水排水再利用。该行动将持续5年,重点关注全国卫生系统、贫困地区及灾区、教育系统、公共系统、居民社区等方面用水。(范 得)

于沙同志逝世

著名诗人、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于沙同志因病于2013年6月4日在长沙逝世,享年86岁。

于沙同志,本名王振汉。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有诗歌集、散文集《第一行足迹》《在密密的森林里》《爱的备忘录》《跋涉之歌》《踏着落花归去》《于沙亲情散文》等12部,先后获国家级和省级文学奖20余次。

鲁庵印泥重新亮相

本报讯 在第31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举办之际,6月13日,国宝鲁庵印泥复出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鲁庵印泥第二代传人、西泠印社名誉社长、93岁的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和第三代传人、印泥大师李耘璋现场讲解演示了鲁庵印泥的制作工艺。

鲁庵印泥由西泠印社早期成员、篆刻家、收藏家张鲁庵于上世纪30年代创制,曾被齐白石等名家和著名印谱定为首选印泥。该印泥鲜艳艳丽、质薄匀净、细腻温润,时间愈久其色泽愈沉静古雅。1962年,张鲁庵在临终前将鲁庵印泥配方托付高式熊,但因世事变故,鲁庵印泥绝迹数十年,直到近年高式熊将秘方捐献国家,才得以重新亮相。鲁庵印泥制作工艺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展现了海派文化的地域特色和精神内核。今年年初,上海还成立了鲁庵印泥制作工艺传习所,力求将其建设成为宣传、学习、展示鲁庵印泥制作工艺的活动中心,继续做好技艺挖掘研究和传承人培养等工作。(王 觅)